

康熙四十三年(1703)，教宗克莱门十一世正式判定，耶稣会士长久以来在中国传教时对中国“礼仪”的迁就，乃是“异端”行为，应当立即予以禁止。翌年年底，教宗委派执行这一决议的特使多罗(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)抵达北京，觐见康熙皇帝，转述教廷关于禁止教徒行用“中国礼仪”的主张。多罗此举激怒圣祖玄烨，导致其颁布圣旨，令在华教士必须遵守“利马窦规矩”，领取有朝廷颁发的特许“票”始得传教，开始对传教采取限制措施，并逮捕、驱逐部分教士，对各地拒不领取特许之“票”者一律押解广州。清朝与教廷的关系严重恶化。尽管此后康熙皇帝一再试图寻求与教廷相互沟通，可是克莱门十一世教宗却一意孤行，对此完全置之不理。无可奈何之下，圣祖玄烨终于下旨：“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，禁止可也，免得多事。”从此，中国开始了漫长的禁教岁月。时为康熙六十年，正值圣祖玄烨去世的前一年，西元1721年。有意思的是，教廷派来改变“利马窦规矩”、摧折耶稣会士辛勤开辟之传教事业的多罗，正是一位与利马窦属于同一国度的意大利人^①。

接续玄烨登上清室帝位的胤禛，对天主教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禁止政策。如果说康熙年间开始的禁教，是清圣祖玄烨为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既有秩序、回应罗马教廷的蛮横态度而不得不采取的对应行动的话，那么，雍正年间变本加厉的禁教措施，则更多地是出自清世宗胤禛个人对权力的绝对控制需求。同时，康熙皇帝与天主教的对立，实际上主要是针对罗马教廷苛刻的传教方式；而雍正皇帝则是针对所有天主教的传教士、教徒，乃至教义。英国学者赫德逊(C.F.Hudson)曾经指出，教廷与清王朝之间的“礼仪之争”，“突出了教皇至高无上的地位，而耶稣会士曾明智地不显露这一特点。这时，康熙的眼中才看到这一事实”^②。对于这一点，雍正皇帝显然比他的父亲要看得更为清楚，也更为严重。法国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沙百里(Jean Charbonnier)神父，在论述雍正年间的禁教举措时指出，这其中一项重要原因，就是“雍正比其父更具有想统治其子民的思想”^③。雍正二年(1724)，胤禛在向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正(Joseph de Moyriac de Mailla)等人阐述他对天主教的政策时，曾经谈到^④：

你们说你们的宗教不是伪教，朕相信这一点。……你们要让所有中国人都皈依基督

① 以上有关天主教在清朝传布的情况，俱参据顾卫民：《中国天主教编年史》(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3年)第二部分《明清时期》，页49—352。下文叙述此类问题，凡未另外注明者，亦同样依据此书。

② 赫德逊(C.F.Hudson，王遵仲等译)：《欧洲与中国》(*Europe and China: 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*)，第十章《耶稣会士在北京》，页282，中华书局，1995年。

③ 沙百里(Jean Charbonnier，耿昇译)：《中国基督教徒史》(*Histoire des Chrétiens de Chine*)，第15章“宽容于宫中，隐匿于各省”一节，页180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8年。

④ 据顾卫民：《中国天主教编年史》第二部分《明清时期》1724年下引文，页264—265。案：这段谈话见于雍正二年(1724)寄往欧洲的一封信中，据冯秉正(Joseph-François-Marie-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)在他撰著的《中国通史》(*Historire general de la Chine*)里刊载了这封信。见沙百里《中国基督教徒史》第15章“宽容于宫中，隐匿于各省”一节，页180—181。